

# 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教育分流机制与政策

陈新忠,刘鸿源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 农民共同富裕是一段时期中国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和制约瓶颈,知识经济社会背景下教育是改造优化农民进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出路。历史上,美国曾在全国各州广设赠地学院开展面向农民的农业工业化教育,实现了大学、农业、农民、政府等多主体互利多赢。从分流施教看,目前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存在没有有效关注多数农民的流源问题、将农民教育置于最低层次的流层问题、多用非正规形式进行教育的流型问题、只顾眼前而忽视长远质量的流质问题和过分强调初级农产品农业的流向问题。面向三农现代化和强国建设,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亟需构建培育新型农民、造就务工市民、幸福农民子代、促使农民回流、加快农民更新的系列促进机制,内外分流相互结合,改造提升和转化循环有机统一。推动五大系列机制良性运行,我国需要立法赋予高等教育承担转化农民的教育分流职能,建立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促农共富教育分流体系,实施配套教育改革和政策保障。

**关键词** 农民;共同富裕;教育分流;促进机制;政策保障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3)02-0011-12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3.02.002

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多种多样,但从农民身份及其来源看,对农村农业产业的维护、继承和发展是应然的基本依托,而维护、继承和发展农村农业产业的素质及能力主要源自教育的培养、提升与造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之洞针对“农事最疲,有退无进”<sup>[1]</sup>的落后局面,多次上书光绪皇帝,劝谏举办新式农务学堂,开启了中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先河;20世纪20-30年代,梁漱溟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农民的落后<sup>[2]</sup>,宣扬针对农民开展生计教育、文艺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以四种教育培育农民“四力”(即生产力、强健力、知识力和团结力),并选点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培养“新民”<sup>[3]</sup>。现时代,面对产业升级和城镇化步伐加速,农民面临着何处致富的抉择和分流,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对于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尤为重要而迫切。

## 一、以教育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亟待突破

### 1. 农民共富是中国共富的前提基础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富裕程度不断提高。2010年年底,我国GDP达到5.879万亿美元,超过同年日本的5.474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sup>[4]</sup>。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政府宣布紫云、纳雍等9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sup>[5]</sup>。在2021年2月25日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告我国脱贫任务全面完成,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离绝对贫困<sup>[6]</sup>。截至2021年底,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19万元,同比增长9.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达到2.998万元,同比增长8.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741万元,同比增长8.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93万元,同比增长

10.5%<sup>[7]</sup>。然而,我国尽管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1万美元,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人民币,但仍有6亿多人每个月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我国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我们应将保障这些人口的民生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从全球比较看,我国当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3万美元以上的水平;从国内比较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达2.56倍,2021年依然相差2.5倍,远高于发达国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大体相当的水平。虽然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达到2.67万元,2021年这一差距增至2.85万元,远高于2010年的1万元和2016年的2万元差距<sup>[8]</sup>。而且,近年来农民增收难度加大,2010—2014年农民收入增速平均比城镇居民高出2.5个百分点,2015—2019年仅比城镇居民平均高0.9个百分点,增速差距不断缩小<sup>[9]</sup>。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仍要加紧追赶发达国家,追求高水平富裕,另一方面迫切需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农民增收能力。

## 2. 当代农民亟需凭借知识资本共富

“知识资本”是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1969年提出的新概念,认为现代知识并非纯粹的知识形态,而是一种动态的资本<sup>[10]</sup>。基于知识生产、分配及使用的知识经济以教育和科技为依托,成为世界发达国家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现代经济产业中,美国微软公司运用电脑软件等系列知识产品打开了计算机应用的大门,产值连续多年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公司、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总和,标志着知识经济的确立。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知识资本贡献率不断提高,预示其在今后社会经济发展中必将成为回报率最高的资本形态,而知识经济亦将成为21世纪的主导型经济。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必将努力借助高等教育谋求社会上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岗位,以确立自己在社会分层流动中的经济社会地位,获得更多更好向上流动机会<sup>[11]</sup>。这一趋势不仅要求从农村分流出去的农民和农民子代必须通过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寻求相应的职业岗位,而且要求留在农村于农业内部分流的农民也要凭借高等教育才能在职业岗位上立足和发展。与传统农业截然不同,现代农业以知识和科技为支撑,集一二三产业为一体,成为一个从繁种育种、增产提质到产后加工、储运保鲜的系统化人类健康新产业,每一生产过程环节只有匹配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和作用。因此,未来农民致富不再凭依肩挑背驮的身体蛮力,而要依靠现代知识的科技力量,否则即使终身务农成为职业农民也会因知识技能落伍而被淘汰出局。

## 3. 教育促进是农民共富的根本途径

现代农业的不断升级换代使得传统农业不仅低效少功,而且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据笔者对农业农村部在湖北实施的“水稻+”综合试点试验项目多年跟踪调查,发现一般种植大户从事湖北特色水稻产业——全年种植中稻+再生稻,中稻每亩每年需要投资田租800元,稻种90元,育秧、运秧和插秧270元,机耕、机整80元,药、肥、水电、人工等田间管理270元,收割70元,成本共计1580元/亩,中稻年收益—332元/亩;再生稻每亩每年需要投资化肥50元,农药和人工30元,水电20元,收割50元,成本共计150元/亩,再生稻年收益692.6元/亩。也就是说,一般种植大户种植中稻+再生稻,在无重大自然灾害侵害情况下,全年收益仅360.6元/亩。随着种植成本增长,水稻收购价下跌,灾害性天气影响,水稻种植可能遭受完全亏损的风险。除此之外,伴随农药化肥浸染、种子地力退化等,传统农产品品质逐步下降,甚至面临侵扰人类健康的危险。在欧洲,农产品不仅质量高,而且价值大。欧洲农民可以用自己生产的5000千克左右水果或蔬菜换回一辆普通轿车,而中国农民即使生产比欧洲农民多10倍的同样产品,也难以购买一辆普通轿车,以等值工业品为参照,目前中欧农产品价值相差10倍以上<sup>[12]</sup>。现代农业以科技为主导,以健康为目标,以企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按照现代产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组织起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农业科技生产经营体系。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下生存和发展,农民必须接受系统化的农业教育,尤其是系统化的高等农业教育,通过教育来提升素质,养成能力,在驾驭和开发现代农业中增收致富。

#### 4. 发达国家有教育促农共富的先例

在发达国家促农共富的先例中,最有特色的是美国和荷兰。荷兰后来居上,虽然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积的0.008%,农民只有全国人口的4%,却创造了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的神话。荷兰农业技术发达,农业创新活跃,呈现出高度产业化、科技化和高端化特征,其农业成就主要源于瓦赫宁根大学为荷兰农业供给了60%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者。农业为荷兰农民创造了巨额财富,全国20%的百万富翁来自农业。美国是农业大国,教育促农走过了160余年的历史。19世纪60年代,美国北方完成了工业革命,而南方仍在继续以黑奴为劳动力的传统种植。为运用工业改造农业,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颁布《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规定每个州有参议员和众议员1人便可获赠30000英亩联邦土地,这些土地可以出售或出租获利,用于建设赠地学院,开展本州农业及工艺教育。1890年颁布的《第二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 II)》要求各州独立建设学院以保护不同种族文化,公平分配土地租金,于是南部地区建立了16个服务于黑人的赠地学院。1965年,《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专门授权开办为西班牙裔服务的农业院校。1994年,《教育赠地地位法案(Educational Land-Grant Status Act)》使印第安部落大学获得土地拨款资格,为主要从事农业推广和农产品研究的黑人学院——塔斯基吉大学提供了充足资金。在系列法案推动下,美国建立了各州赠地农业学院院长兼州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该体系促使美国农民50%以上具有大学学历,且子承父业比例很高;促使美国农业实现了从耕地、播种、灌水、施肥、喷药到收割、脱粒、加工、运输、精选、烘干、贮存等几乎所有农作物生产领域的机械化,成为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和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也促使农民普遍拥有了较高收入,平均收入水平与城市收入水平基本持平。在教育作用下,大批农村人口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离开农场走向城市,促进了底特律、芝加哥等一线城市和代顿、托莱多等二线城市的发展。据统计,1860年美国3144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占80%左右,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58%左右。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比达到51.2%,首次超过农村人口<sup>[13]</sup>。教育也为黑人提供了一条改善际遇的最佳途径,1920年注册入学的十四五岁费城黑人男性青少年达到84.5%,而父母是外国移民的男性青少年入学率仅有72%。起初,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住在南方,属于农村人口;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几乎都住在城市。从1910年到1980年,黑人在北方城市的人口比例普遍从1%~6%提高到了10%~60%<sup>[14]</sup>。如今,美国农业从业人口仅占1%(300多万),但农产品年产值约3000亿美元,且近90%用于出口,出产粮食可供全球20亿人口食用。在美国,平均一个农场农民可以耕种450英亩土地,同时饲养数万只鸡/牛,产出的粮食和鸡/牛肉达10余万千克,可供养130多个人生活。美国赠地院校在世界大学学术排行(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前150名美国院校中占43%,前50名中占41%,前5名中占50%;在QS世界大学排名(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QS)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科学常年居于世界前三位<sup>[15]</sup>。农业院校的科研成果成功催生了新型农业模式,创新科技成果推广给农业增产带来超过75%的贡献。2021年,美国农民平均年收入达43446美元,约为中国农民的17倍,而美国爱荷华州全职农民的年收入平均达50000~70000美元,有些农民的年收入甚至高达100000~250000美元<sup>[16]</sup>。

#### 5. 机制政策是教育促农共富的抓手

目前,我国教育促农共富的形式多种多样,但缺乏稳定的机制带动和政策引导。李强把现代中国社会群体划分为富有、贫困和中间三大阶层,认为社会阶层变化的动因是改革开放引发的贫富分化<sup>[17]</sup>;李培林等以“职业”为标准审视现时代中国社会流动,认为社会分层流动的主因是城乡二元体制下市场经济规则的激励推动<sup>[18]</sup>。白天亮等调研发现,如果经济社会发展缺乏促进合理流动的机制,容易造成弱势群体边缘化,给社会健康进步带来消极影响<sup>[19]</sup>。陆学艺认为受教育程度是干预人们地位获得的一种变量<sup>[20]</sup>,董泽芳<sup>[21]</sup>、郑育琛等<sup>[22]</sup>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论证社会阶层流动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分流与毕业生在社会上分层流动存在密切联系,高等教育在其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优势阶层地位再生产的工具作用,表现出固化社会阶层的发展趋向。现有学者对于教育分流

影响各阶层社会分层流动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地域、某一方面的局部实证分析或常识性、理想化的一般理论探究,较少学者从全国层面系统审视现状,深入构建针对性应然科学机制。随着现代社会入职标准提高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高等教育对社会成员分层流动的作用仍将日益凸显,迫切需要广大学者加紧研究教育分流尤其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机制和政策,指导教育分流合理促进社会分层流动。我国是农业大国,传统农业人口众多,研究教育分流尤其是高等教育分流促进农民进化、分流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和政策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共同富裕目标追求背景下我国学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 二、当前教育分流促农共富存在的问题

教育是一项将受教育者纳入不同地域、层次、类型、形式等教育机构之中进行分流施教的社会活动,影响着社会个体未来在社会上的分层流动。“共富”是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状态,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目标。教育促农共富是一项系统工程,以小学教育为起点,以中学教育为基础,以大学教育为目标,涉及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职业需求愈来愈知识化的时代背景和未来指向下,高等教育成为农民共富的主要选择和重要支点。根据教育对农民分流施教的过程及其结果,教育分流可以分解为流源、流层、流型、流质和流向五个方面。其中,流源表示教育对象从何而来,流层表示学生处于何等学校层次或教育层次,流型表示学生就读学校和接受教育的类型,流质表示学生受教育的质量,流向表示学生受教育后的去向,五者共同构成了对农民分流施教的教育体系。从流源、流层、流型、流质和流向五个维度审视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现状,可以系统认识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反思和构建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科学机制。

### 1. 当前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源问题

流源即分流施教的受教育者来源,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源是指这一活动施教的农民对象背景状况。考察哪些农民对象接受了相关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研判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农民范畴。截至202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虽已达到全国总人口的63.89%,农村常住人口虽已降至全国总人口的36.11%,但是农村户籍人口仍有7.71亿,城市户籍人口实际不足6.4亿;近年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达9亿,这意味着其中1.3亿人虽已不是农村户口,但仍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sup>[9]</sup>。目前我国促农共富的教育除了转移农民子女的普通教育之外,主要有教育部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和农业农村部开展的农民教育培训等。在普通教育方面,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尽管愈来愈多社会个体享有高等教育机会,但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呈现愈来愈少趋势。温家宝曾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谈到,“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sup>[23]</sup>。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招收农民子女比例持续下降,其中北京大学自2000年以来招收的农民子女仅占当年新生的10%左右<sup>[24]</sup>,后在提高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招收比例的要求下,北京大学大力实施国家贫困专项计划和筑梦计划,农村生源2022年亦仅占15%。然而,2010年和2022年农村户籍考生分别占当年考生的比例达62%、55%<sup>①</sup>。“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是教育部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将高等教育送到农村,为农村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试点项目,2004年秋国家开放大学试点招生以来,共招收农村行政管理、乡镇企业管理、农业经济管理、畜牧兽医、设施农业技术等专业学生100余万人。其中,湖南省力度最大,17年共招收农民大学生139286人,毕业学员94552人,招生数和毕业生数均占全国同期“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总数的1/6以上。我国农民教育培训与新中国同步,而现代农民教育培训项目以1990年农业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为标志,培训目标由能识字、懂基础农技向培养觉悟高、

① 见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北京大学生源比例揭晓:农村生源442人,占比仅15%,留学生达388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10115322938435646& wfr=spider& for=pc>.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转变。该培训项目虽然涉及面广,但从“培养100万名具有中高等学历的产业发展带头人、社会事业带头人和基层组织负责人,培育500万名高素质农民”的“十四五”农民培训规划目标可以看出,真正受益的农民人数十分有限。总之,相较于农村户籍的7.71亿人口而言,目前我国无论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和农民教育培训项目,对于农民共富的有效教育影响及促进规模都十分有限;甚至,“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还更多停留在照顾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及其后备力量等优势人群层面,农民教育培训项目尚存在不少优势人群反复受训现象。

## 2. 当前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层问题

流层即分流施教中受教育者所接受教育的层次,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层是指这一施教活动中农民接受的教育层次。考察农民接受了何等程度的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研判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提升程度。在我国,职业收入与教育层次普遍密切相关,且呈正态分布状态。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秋季大学生就业报告》对不同学历人群薪资进行了跟踪调查,分析表明毕业生的薪资待遇与学历水平普遍成正比关系,学历越高,薪酬越高<sup>①</sup>。前程无忧最新发布的《2021中国重点大学应届毕业生求职状况报告》对来自65所211/985高校、拿到offer的5539名毕业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毕业生的学历越高,收入也越多<sup>②</sup>。王奕俊等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职业教育对社会地位及社会流动的影响,发现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与接受初中教育的群体相比,具有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比较优势,并显著优于其父代;但与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群体比较,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经济地位,都处于相对劣势<sup>[25]</sup>。在国外,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一般亦呈正比关系。2018年,法国25~64岁人群以“高中学历者的经济收入水平=100”为参照,大学学历者的经济收入水平远远高于该标准,并且随着其年龄增大,收入水平持续提升;而高中学历以下者的经济收入水平则低于此标准,并且随着年龄增大,相对收入水平持续降低<sup>[26]</sup>。美国大学和雇主协会分析10个城市不同学位带来的收入差距,发现新泽西高中以下学历者平均年薪为19000美元,高中学历者收入则增加51%;本科学历持有者收入提高幅度最明显,比副学士学位持有者年薪增加83%;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者,收入又比本科增加86.5%。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数据亦显示,高中学历者每周收入为746美元,而本科毕业生每周收入1248美元,硕士学位持有者每周收入1500美元。尽管学历层次影响收入,但从目前我国促农共富的教育层次看,农民子女在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多处于地方院校的本科教育及专科教育层次,属于普通高等教育层次的最低端;农民自身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中多处于专科教育层次,在农民教育培训项目中多处于无学历或中等教育层次,位列我国中高等教育层次的最底端。根据国内外社会个体学历层次与经济收入的普遍关系,现在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中的教育层次定位势必对农民收入提升影响微弱。

## 3. 当前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型问题

流型即分流施教中受教育者所接受教育的类型,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型是指这一施教活动中农民接受的教育形式。考察农民接受了何等类型和形式的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研判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提高状况。在我国,人才招聘单位过分强调全日制普通教育使得教育类型和形式与个人职业岗位及其经济收入密切相关。据笔者近年对湖北省范围内省、市(州)、县(区)、乡(镇)不同层次或地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系统和企业系统的高校毕业生2300人进行长期调研,发现全日制普通高校在中等以上收入的职工中比例平均达到90.00%以上,其中在上等收入职工中比例达到96.25%以上,而自学考试、成人教育、广播电视大学(现更名为国家开放大学)和网络教育四种教育形式的毕业生在各个地区的各种收入等级群体中的比例平均不到10.00%。这一研究说明,高等教育的类型分流使全日制普通高校教育成为社会成员获得职业岗位并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

① 见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24058.html>.

② 见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492774562\\_120267334](https://www.sohu.com/a/492774562_120267334).

一是因为高等教育尽管有多种形式,但将全日制普通高校作为主体教育形式进行发展,其他形式的教育处于从属地位;二是因为政府和社会对各种高等教育学历的认可程度不同,一般认为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历含金量最高,在选择职业和增长薪酬时最有参考价值,甚至将其当作唯一的就业凭证,而其他高等教育形式的学历则大打折扣;三是因为社会个体在选择高等教育形式时,大都将全日制普通高校作为第一选择,成绩较好的学生基本上都进入了全日制普通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成绩较差的学生才被迫选择非全日制普通高校接受教育,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受到诸多不利影响<sup>[27]</sup>。尽管教育类型对职业岗位及其经济收入产生重大影响,但从目前我国促农共富的教育类型看,跻身于“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农民接受的主要是广播电视大学即国家开放大学教育,在高等教育类型中属于非普通高校教育或非正规高等教育,并且属于非全日制教育;参加农民教育培训项目的农民接受的多为非学历教育,即使部分有学历的中等教育亦属于非全日制的非正规形式教育;而更多因分数原因无法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女也无奈选择了自学考试、成人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和网络教育等教育形式,时时面临着学历贬值的风险。现行职业文化和教育文化背景下,我国农民接受的教育类型决定了其很难在经济收入竞争中超越学历规制而胜出。

#### 4. 当前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质问题

流质即分流施教中受教育者所接受教育的质量,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质是指这一施教活动中农民接受的教育质量状况。考察农民接受了怎样质量的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研判教育分流在促农共富中赋予了农民何等的能力和潜力。在我国,学业成绩是毕业生入职的首要条件,很多时候甚至成了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唯一条件。在用人单位首选学业成绩优秀者的影响下,毕业生学业成绩或者考试分数成了大多高校教育质量主体的代名词。据笔者近年对湖北省范围内省、市(州)、县(区)、乡(镇)不同层次或地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系统和企业系统的高校毕业生2300人进行长期调研,发现学业成绩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在中上等和上等收入的职工中比例分别达62.00%、62.50%,学业成绩良好的高校毕业生在中下等收入的职工中比例为61.00%。研究结果说明,高等教育的学业成绩分流使得学业成绩优秀和良好的毕业生成为各个地区各种收入等级群体中的主要成员,影响着高校毕业生的社会分层流动。然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分流中人才培养质量以学业成绩为主要衡量指标,做事能力、交流能力、技术能力、研究能力等较少纳入其中进行评价,高分低能现象普遍存在,“重分轻能”“重学轻用”等弊端影响了社会分层流动效果<sup>[28]</sup>。尽管教育质量影响着毕业学员职业发展及其收入状况,但从目前我国促农共富的教育质量看,教育部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仍然主要以课程考试成绩考查学生学习状况,农业农村部实施的农民教育培训项目也仍然以课程和讲座为主,农业农村部开展的中等学历农民培养亦主要通过课程成绩累积学分,高等教育机构对农民子女进行的普通高等教育更是如此,所有这些教育对于学员实践、实验、试验、技能和潜能的培育与评价较少。面向未来推进农业产业不断升级和促进自我经济收入不断提高,我国农民接受这种只顾眼前分数而忽视长远发展的教育,只会使自身在历次变革中力不从心。

#### 5. 当前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向问题

流向即分流施教中受教育者接受完教育后的职业去向,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向是指这一施教活动中农民接受教育后的从业方向。考察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去往什么样的职业方向,一定程度上可以研判教育分流在促农共富中对农民引导是否科学与合理。无论中外,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施教者大都主张学生对口就业,因而要求学生在校期间一定要将专业知识理论掌握扎实,以便能够在职业岗位上发挥专长、学有所用。然而,一方面,未来职业的速生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施教者很难精准对口未来职业开设专业,进而对学生进行分流施教;另一方面,未来职业的新生性和孱弱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施教者很难快速编写出系统的专业教材开展未来专业教学,难以做到学校专业完全匹配未来职业。当代农业快速从第一产业演变为“1+2+3”产业,催生出诸多新的行业产业和职业岗位。然而,从目前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流向看,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教育部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或者农业农村部实施的农民教育培训项目,都主要将教育内容定

位于初级农产品农业,将教育目标定位于培养走进初级农产品农业产业行业的人才。这一内容和流向定位不仅将延误我国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而且将大大减小新一代职业农民的社会贡献,降低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收入,阻碍农民共同富裕。

### 三、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机制构建

机制本指事物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反映了事物存在和运行的本质<sup>[29]</sup>。反观流源、流层、流型、流质和流向构成的分流施教系统所呈现的教育促农共富现状及问题,可以发现当前以提升农民文化素养和技能水平为主导的教育分流促农共富机制存在着旨在培育重点少数农民的目标偏颇和囿于农业改造农民的行为偏颇。重构教育分流促农共富机制,亟需从侧重提高少数农民向有效提升广大农民转变,从围绕农业现代化改造农民向面向国家现代化转化农民转变,以培育新型农民、造就务工市民、幸福农民子代、促使农民回流、加快农民更新为目标构建系列促进机制,真正将农民转化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内在力量,在强国建设中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 1. 培育新型农民的教育分流促进机制

培育新型农民是教育转化农民的核心通道,培育新型农民的教育机制是教育促农共富的内分流机制。农民致富的根本场域在农村和农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农业强大和农民富裕的基本出路。发达国家农民大都学历高,素质好。在美国,50岁以下的农民大多拥有大学及以上文凭,学历为高中及其以下者不足7%。在其他发达国家如英、德、法、加等国,新的职业农民需要“持证”上岗,农业专业证书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入职资质。目前我国农民学历普遍较低,高中及其以下者达90%左右,并且农民职业培训水平不高,农民职业教育还未体系化。为培育现代农民,建设农业强国,我国应建立政府、产业、高校与农民“四位一体”职业教育分流机制。首先,建立政府授权固权的权力机制。针对目前农民职业培训及职业教育机构水平参差不齐,职业教育设计及等级处于教育最低端的问题,借鉴美国建设赠地学院“三位一体”推动农业工业化做法,我国政府要授权农业本科院校统筹本地区农民职业培训及职业教育,不断巩固其教育行使权,高起点开展农民职业培训和农民职业教育<sup>[30]</sup>。其次,建立高校产业互动的教育机制。针对当前农民职业培训及职业教育理论性过强而实践性不足的问题,我国政府要扭转农业高校育人脱离产业的局面,建立高校介入产业、指导产业、与产业互动的人才培养机制,培育产业能力优秀的农业人才。再次,建立农民积极响应的融入机制。针对不少农民耽于传统农业、进修学习积极性不高的现象,我国政府要大幅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产业盈利,建立产业升级换代淘汰制度,以此鞭策和激励农民及其子代积极主动到农业高校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通过自觉融入农业教育、内在推进农业强国而实现农民共富。

#### 2. 催生农民市民的教育分流促进机制

催生农民市民是教育转化农民的重要通道,催生农民市民的教育机制是教育促农共富的外分流机制。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全面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市民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251万人<sup>[30]</sup>,约占当年农村常住人口49835万人<sup>[7]</sup>的近60%。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指出,我国近年因行政区域变动而转为城镇人口的农民至少还有1.3亿,他们大部分的生活地点、生活方式和从事行业都没有变化,亟待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市民化<sup>[9]</sup>。以教育促进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为新生市民,是改变农民身份、提升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战略行动,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乃至全民共富的必由之路。我国政府、高校和企业——尤其以农民工为主要力量的大型企业,应联手开展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入职、生活、发展及教育子女等方面的系列问题。首先,建立高校和企业的联培办学机制。为便于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政府支持一地一所高校联合企业建立职业教育学院,专门针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职业发展。其次,建立高校为主导的教育增进机制。高校采取专业自由、管理统一的方式对招收的农民工进行“专业+通识”教育,从思想、文化、技能、生活等方面增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再次,建立企业为主辅的产业参与机制。以技能为

主,企业提供农民工职业教育50%的课程,促进农民工凭技能于城市立命,增强自我建设城市的自豪感,在投身城市产业发展中提高地位和收入,与城市新老市民共同富裕。

### 3. 幸福农民子代的教育分流促进机制

幸福农民子代是教育转化农民的接力通道,幸福农民子代的教育机制是教育促农共富的又一分流机制。农民子代是农民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的建设主体,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农民共富的延续状况。鉴于农村硬件建设普遍不如城市,人们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成为2000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由此带来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引发了教育代际传递乃至收入代际传递的阶层固化。加上人们传统意识中大都认为,农业科技含量低,职业教育层次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农民子女自小树立了逃离农业的观念,亦使得不少受过职业教育的人不得不接受低地位、低收入现实。面向知识经济社会,农民子女借助高等教育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乃大势所趋,保障农民子女凭依公平教育获取相应职业收入是高等教育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首先,建立高等教育分层提升机制。针对农民培训和农民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较低、农民子女大多接受高职高专教育这一社会事实,为实现城乡之间和人人之间的共同富裕,顺应现代产业和人类事业对人才综合素质愈来愈高的职业需求,我国应推进以专科为预科、以本科为起点的人才培养学历层次计划,通过学历提升推动能力提升、产业升级和收入趋近。其次,健全高等教育流源拓展机制。针对农民培训和农民职业教育中受益农民数量有限、农民子女享有国家重点大学教育者比例较少的问题,我国政府要指导高校在本科以上全日制学历教育尤其国家重点本科以上全日制学历教育中向农民及其子女倾斜,适度增加相应招生指标和招生比例,使其比较充分地享受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再次,完善高等教育流型活化机制。为便利农民有时间学习和农民子女在农村帮业创业,高等教育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拘一格地更多开展全日制之外的多种教育形式,保证多元形式教育质量,吸引农民及其子女运用高等教育知识武装自己。通过健全完善幸福农民子代的教育分流促进机制,我国政府和高校协同促使农民子代不仅拥有更多高等教育机会,而且能够凭借自己在学业上的不断努力实现未来社会地位提升和岗位收入提高。

### 4. 促使农民回流的教育分流促进机制

促使农民回流是教育转化农民的延伸通道,促使农民回流的教育机制是教育促农共富的又一内分流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80%以上人口在农村。直至今日,80%以上的市民都是农村移民或农民的后代。鉴于城市自产生之后优越性一直高于农村,离开农村、走向城市成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广大农村人的行为选择。随着时间推移,当农民工、农民子代和城市市民充分认识到农业农村的利益和优点而重返农村农业,就是农民回流之时。除了在现有农民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之外,通过教育促使农民回流也是造就新型职业农民的有效途径,是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重要方式。建立促使农民回流的教育分流促进机制,要从影响和转变农民工、农民子代和城市市民对农业农村的认识入手。首先,建立农民工特色农业技术教育机制。在农民工外出务工之前,当地政府要求农民工必须通过政府农民培训项目学习掌握一门地方特色农业技术;或者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教育中,高校要求农民工通过学校安排的特色产业技术课程学习掌握一门现代农业技术。这样便于农民工了解现代农业技术的含量和效益,为农民工回流农业农村提供技能和思想基础。其次,建立农民子代“三农”通识教育机制。中小学校要立足当地“三农”特色产业在科学课程中为学生讲解“三农”新兴技术,描绘“三农”产业发展前景;高等院校则要求农民子代不忘历史,至少选修一门“三农”通识课程,能够理性分析“三农”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这样便于农民子代在未来工作和学习中正确认识“三农”发展,回流参与农业农村建设,实现与“三农”共进同富。再次,建立城市市民“三农”形势教育机制。各级政府要运用各种网络政务平台推送“三农”发展信息,帮助市民认识“三农”发展形势;国家开放大学要与政府、社区结合,在网络公共平台上向市民推送“三农”公益讲座和课程,为市民分析“三农”发展现状及走向。这样便于城市市民客观把握“三农”趋势,根据自身情况回流参与“三农”建设,带动农民共富。

### 5. 加快农民更新的教育分流促进机制

加快农民更新是教育转化农民的循环通道,加快农民更新的教育机制是教育促农共富的内外分流融通机制。当前尽管世界各国仍在按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分类统计产业数据,但实际上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区分愈来愈模糊,产业之间的交叉越来越多,一二三产业融合已成必然趋势。同时,世界各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快速缩小,互联网愈来愈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面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之势,社会成员将在不同岗位和城乡之间频繁转换,农民更新加快亦将成为社会常态。为增强农民更新的职业情怀和专业能力,我国高等教育亟需强化产业认知和产业实践,保障农民及其子女在共同富裕中持续向上流动。首先,构建面向全体高校学生开展农业教育的泛教育机制。为促使更多有志青年了解农业,从事农业,依托现代农业致富,我国高等教育应在全体学生中开展“农业模块教育”,激发他们献身农业的理想和行动。其次,建立农科理论联系农业实践的职前优秀生选拔机制。为促使最优秀的人从事农业,我国农业院校要在指导地方农业技术推广中培养人才,在学制及学分一半左右为实习实践的历练中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地选拔优秀毕业生入职农业部门及其企业,淘汰实践能力一般或较差者。再次,健全以农业本科院校为主导的农民教育和进修机制。为解决当前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师资及培训水平参差不齐、相差悬殊的问题,提高农民教育培训质量,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以农业院校为主体的农民继续教育和进修机制,延长教育和培训时长,加强实践操作训练,促使农民经过高校轮训真正从理论到实操都得以更新,日益增强服务“三农”和提高收入的本领。

## 四、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政策建议

培育现代农民、催生农民市民、幸福农民子代、促使农民回流和加快农民更新等五大教育促农共富机制彼此关联,互为依托,一起构成了农民共同富裕的教育分流促进机制体系。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系列机制运行是一项以教育为主导的多主体互动行为,其常规开展需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予以多方面的政策支持。从该项活动进程及其结果看,教育分流促农共富机制有效运行亟需从办学职责、分流体系、教育改革、财政支持和企业参与等方面予以保障。

### 1. 赋予普通高校招收转化农民的教育分流法定职责

当前我国普通高校虽然参与农民职业培训和农民职业教育,但并非农民职业培训和农民职业教育的实施主体。顺应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和农业现代化对职业农民的需求,我国亟需从法律上明确普通高校招收转化农民的教育分流职责,以教育大幅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及其水平提升。其一,国家应立法赋予高等院校面向农民招收普通高等教育学历学生的职责,将农民教育纳入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一方面应对未来我国出生率下降和高考生源减少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这一渠道将相当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其二,国家应立法赋予高等院校实施农民职业教育的职责,规定每个省(区、直辖市)至少有一所农业本科院校或综合性高校的一个农业学院承担本地区的农民培训及职业教育,参与并逐渐主导区域农业技术推广,在产业实践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其三,国家应立法指导高校建立农民工职业教育学院,促进高校与企业联合开展农民工职业教育,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入职、发展、生活、育子及城市文化融入等问题。

### 2. 建立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促农共富教育分流体系

根据“分工有别、地位平等”的人类理想和社会原则,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应具有同等的地位和身份。当前,我国已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普通高等教育以本科教育为主体,职业高等教育亦应构建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教育体系。在美国,赠地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体,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开展农业工业化教育带来了美国农业的高档次发展。创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初级学院——社区学院,主要职能便是转学教育,凡年满18周岁且在美国居住的美国公民均可免试申请入学。这样的招生政策使得社区学院的招生人数占到美国高校的41%,在校人数占到美国在校大学生的42%。加州大学系统大学无一歧视社区学院生源,每年都会为加州社区学院学生提供较多入学名

额。2011—2020年,加州大学系统大学每年入学的本科生生源中大约1/3是社区学院转学学生。排名位居世界高校前列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连续10年每年入学的学生中都有2000名以上来自加州社区学院的转学生。社区学院将专科层次的副学士教育与本科层次的学士教育连为一个统一整体,创立了“2+2”专本衔接模式,为社区学院学生搭建了上升通道,加速了美国本科教育普及化进程。面向未来农业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高质量需求,我国亟需建立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促农共富教育分流体系。其一,将职业教育普遍升级为本科教育,培养本科层次的涉农职业技术人才,以适应未来农业对高素质和高能力科技人才的要求。其二,设立预科班,对招收的达不到本科入学标准的学生进行预科教育,待其达到本科入学标准后再转入本科教育阶段,保证本科职业教育生源质量。其三,建立从预科、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促农共富教育分流体系,营造一视同仁的普职学历同等相待社会文化,培养涉农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带动我国农业快速健康发展。

### 3. 改革制约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教育教学育人弊端

育人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提高育人质量必须先期解决育人过程中的基本问题。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还在流源、流层、流型、流质、流向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影响着教育教学高质量育人。以教育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教育分流亟需改进和完善分流施教的各个环节。其一,改革流源和流速,克服以往教育促农共富中过分关注重点人群的流程问题和教育培训时长过短的流速问题,面向广大农民实施完全弹性学制,鼓励农民坚持终身学习,通过累积学分完成各个学段的学业。其二,改革流层和流型,克服以往教育促农共富中将农民教育置于最低层次的流层问题和多用非正规形式进行教育的流型问题,将普职同等对待地开展以本科人才为主体的分流施教,允许农民采用全日制与非全日制有机结合的形式接受各种教育和培训。其三,改革流质和流向,克服以往教育促农共富中只顾眼前而忽视长远质量的流质问题和过分强调初级农产品农业的流向问题,强化实习、实践、实验、试验和技术推广,切实提升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学生首次教育和回流、更新等再次教育的质量,鼓励接收过教育的农民及其子代面向三大产业而非仅仅围绕第一产业就业创业。

### 4. 实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的政府财政专项支持政策

我国农民在现行城乡二元体制下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国家政府应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对农民给予补偿,促使其拥有共同富裕的持续能力。1944年5月,美国为补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服役人员做出的贡献,减少战后可能出现的高失业率,颁布了著名的《军人权利法案》(又称《1944年军事人员再适应法案》)。该法案规定,凡战时服役90天及以上的军事人员,均可获得政府提供的1~4年高等教育以及每学年500美元的学杂费和每月50美元的生活津贴。在这一法令引导下,1944—1956年约有300余万美国退伍军人进入高校学习,高等教育成为他们谋取较好社会职业、进行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资质,也为战后美国培养了数百万计的各种专门人才<sup>[31]</sup>。借鉴美国对待战时军人的做法,我国也可以为青年农民提供免费高等教育。其一,政府可以出台《农民教育权利法案》,为18~40岁有意愿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提供高等教育机会,财政支付他们一定比例(50%~100%)的学费和生活费。其二,政府应对农民教育及培训提供财政支持,不仅保障其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条件,而且充分资助农业院校通过“奖、助、贷、免、补”等手段确保家境贫寒的农民及其子女顺利接受教育。其三,政府要号召社会组织及其成员捐助农民教育,充分吸纳民间社会资本注入,逐渐使企业和个人对农民教育的捐资成为社会风气,形成稳定的捐助流,并督促做好资金使用监管。

### 5. 促进企业参与教育分流促农共富及师资水平提升

面对企业正在成为各种技术创新实体的不争事实,面向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正在重构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趋势,教育分流促农共富必须高度重视涉农企业参与和“双师型”教师塑造。目前我国高校教师大多喜欢躲在象牙塔内撰写论文和培养学生,企业技师大多忙于眼前利益而不愿联合高校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致使高校人才培养中教师普遍实操技能差,企业不满意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教育

与产业“两张皮”现象突出。为根除这一痼疾,我国教育促农共富必须从政策上吸引涉农企业主动参与和农科教师自觉改造。其一,政府要明确涉农企业联合农业高校培养学生的职责,规定企业每年营销收入中用于人才培养的经费比例以及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后享受的免税比例,调动企业联合高校共同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其二,政府要明确农业高校培养人才的课程和环节至少1/3在涉农企业完成,规定高校与企业的实质性联合培养不得少于人才培养工作总量的1/2,推动高校主动联合企业改进人才培养过程和质量。其三,政府要明确农业高校教师到涉农企业实践的时长,规定青年教师入职头五年至少要在企业累积实践1年以上,其他教师每次职称晋级前要在原职称任职期间至少到企业累积实践1年以上,促进教师在企业实践中历练能力,实现重大创新突破。

## 参 考 文 献

- [1]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2]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3]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4] 林倩娅,舛友雄大.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EB/OL].(2011-02-14)[2022-07-26].<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1-02-14/100225508.html>.
- [5] 张艳玲.中国发布:832个国家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EB/OL].(2020-11-24)[2022-07-30].[http://news.china.com.cn/txt/2020-11/24/content\\_76943859.htm](http://news.china.com.cn/txt/2020-11/24/content_76943859.htm).
- [6]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2-25)[2022-07-30].<https://www.12371.cn/2021/02/25/ART11614258333991721.shtml>.
- [7]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2-02-28)[2022-07-30].[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
- [8] 魏后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战略选择[EB/OL].(2022-01-12)[2022-07-3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3964325819264233&wfr=spider&for=pc>.
- [9] 唐爱琳.农民增收难城乡差距大 农业农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EB/OL].(2022-01-11)[2022-07-30].<https://china.caixin.com/2022-01-11/101828634.html?cxw=Android&Sfrom=Wechat&originReferrer=Androidshare>.
- [10]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M].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 [11] 陈新忠,李忠云.大学经营及其风险防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2):79-81.
- [12] 陈新忠.高等教育分流打通流向农村渠道的思考与建议[J].中国高教研究,2013(3):36-41.
- [13] 曹峰,吴进进,邵东珂.美国农业福利政策的演变(1862—2000)[J].美国研究,2015(2):132-149.
- [14] 霍华德·丘达柯夫,朱迪丝·史密斯,彼得·鲍德温.美国城市社会的演变(第7版)[M].熊茜超,郭旻天,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 [15] 陈新忠.行业大学与产业强国:高校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重构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 [16] 舒大明.美国“农民”的收入为什么那么高?我们能否学习他们的农业模式?[EB/OL].(2022-03-09)[2022-07-30].[https://news.sohu.com/a/528366991\\_121335607](https://news.sohu.com/a/528366991_121335607).
- [17]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 [18]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19] 白天亮,曲哲涵.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N].人民日报,2010-9-16(9).
- [20]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21] 董泽芳.坚持科学发展观 促进高等教育合理分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1):87-91.
- [22] 郑育琛,武毅英.我国高等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再审视[J].现代教育管理,2014(6):1-6.
- [23] 赵婀娜,田豆豆.重点高校农村学生越来越少[N].人民日报,2009-01-15(11).
- [24] 郭国松.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持续滑落 北大仅1成[EB/OL].(2012-03-08)[2022-07-10].<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mJuw2I>.
- [25] 王奕俊,胡慧琪.“安全网”还是“分流器”?职业教育对于社会流动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FPS的证据[EB/OL].(2022-08-01)[2022-08-10].<https://mp.weixin.qq.com/s/aEfWmwPdIVmnNJFG3DSXmQ>.
- [26] 陈新忠,王苗.法国以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的经验及启示[J].教育评论,2021(8):3-9.
- [27] 陈新忠.分层与流动:高等教育分流的社会影响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28] 陈新忠,刘红.高等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机制研究[J].高等教育评论,2021,9(2):26-39.
- [29] 陈新忠.农民的出路: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机制与政策[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6):80-89.

[30] 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22-04-29) [2022-07-31].[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4/t20220429\\_1830139.htm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4/t20220429_1830139.html).

[31] OLSON K W.G.I.Bill, the veterans and the colleges[M].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4.

## Educational Classifica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to Promote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CHEN Xinzhong, LIU Hongyuan

**Abstract** The failur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is the biggest weakness and bottleneck of China's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In the background of knowledge economy society,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transform and optimize farmers and realize their common prosperity. Historical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t up land grant colleges in various states across the country to carry ou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education for farmers, realizing the multiple wins of universities, agriculture, farmers, governments and other entitie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ursuit of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such as lack of effective attention to the source of most farmers, placing farmers' education at the lowest level in the classification, using more informal forms of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immediate gains and ignoring the long-term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overemphasizing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Fa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 and farm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ful country, China's educational classification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urgently needs a series of promotion mechanisms to cultivate new farmers, foster migrant workers, make farmers' children happy, promote farm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and speed up farmers' renewal,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remoulding,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cycling. To promote operating of the five series of mechanisms, China needs to legislate to endow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educational classification function of transforming farmers, establish an educ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with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s the main body to promote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and implement supporting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cy guarantee.

**Key words**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educational classification; promoting mechanism; policy guarantee

(责任编辑:金会平)